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理论演进、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

李子瑶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1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30日

摘要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正在推动政府决策从主要依靠经验转向更多依赖数据。文章对近十年来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首先回顾了理论发展过程，指出研究焦点从早期的循证决策，逐步扩展到数字治理，并进一步深入到对算法决策的批判性审视。其次，分析了由数据、智能分析和实际应用构成的技术体系如何支持决策，并探讨了其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场景中带来的效率提升与相关风险。文章特别总结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实践，其特点是注重战略统筹与制度协同，并将增进民众福祉作为价值旨归。最后，文章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建议未来应更关注技术应用的微观过程、构建有效的风险治理机制，以及发展符合本土实际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

大数据，政府决策，智能化，数字治理

Big Data-Driven Intelligent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oret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Pathways, and Future Prospects

Ziyao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January 9, 2026; accepted: April 21,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The convergence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riving a shift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from primarily relying on experience to depending more on data. This paper reviews significa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begins by tracing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noting that the research focus has expanded from early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to digital governance, and further to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Secondly, it analyzes how the technical system, comprising data,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pports decision-making, and explores the efficiency gains and associated risks in scenarios such as urban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The paper particularly summarizes China's practices in this area,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enhancing public well-being. Finally, it identifies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suggests that future work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icro-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construct effective risk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develop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ailored to local contexts.

Keywords

Big Data,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telligitiz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在深刻重塑国家治理格局[1]。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关乎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然而，传统依赖有限信息与部门经验的决策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存在信息滞后、响应迟缓与协同困难等问题[2]。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大数据实现对治理状态的多维度监测，人工智能则赋予深度分析能力，共同推动政府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型。实践中涌现的“城市大脑”等应用，已初步展现技术赋能的潜力。

然而，技术与治理的结合并非简单的工具替代。大数据如何改变决策逻辑？不同场景中的应用成效如何？伴生哪些数据质量、算法局限与伦理风险？梳理这些问题，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1.2. 核心概念界定

为明确研究边界，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1) 大数据：本研究视大数据为一种战略资源与新型方法论，核心在于通过分布式计算、机器学习等创新模式，从海量、多样、高速的数据中挖掘支持决策的深层洞见[3]。

2) 政府决策智能化：指政府在政策全过程中集成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通过对多源信息的整合研判与政策效果的预测优化，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效能。其核心特征是以数据驱动增强人类判断。

3)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特指以大数据资源为基础、以智能分析技术为核心引擎、以提升公共决策质量与效能为目标的新型决策范式。它强调从数据到决策的全链条技术赋能。

1.3. 研究范围与结构安排

本文聚焦于 2013~2025 年间中外学界相关重要文献，旨在对“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研究

进行述评。全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理论演进；第三部分剖析技术体系与应用场景；第四部分进行风险挑战与批判性反思；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展望未来方向。

2. 理论演进与研究脉络

要理解大数据如何改变政府决策，首先需要理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如何逐步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虽然起步时间不同，但都呈现出从早期关注技术工具的应用，逐渐深入到对治理体系变革和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反思的清晰脉络。

2.1. 国外研究的主要路径

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发展较为成熟，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相互关联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循证决策理念的深化与拓展。其核心主张是公共政策应建立在扎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靠政治直觉或过往经验[4]。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政策证据。进入大数据时代后，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利用大规模、实时、非结构化的数据，来生成更及时、更细致的政策证据。学者们不仅关心证据如何产生，也更加关注证据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如何被传递、解读、采纳和使用，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从数据到证据，再从证据到政策”的有效链条[5]。这条路径为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政策过程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

第二条路径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系统化审视。这一路径超越了将技术单纯视为工具的视角，开始思考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政府的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模式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例如，有学者提出的“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就分析了信息技术如何促进政府业务流程的整合、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以及服务的重新一体化[1]。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政府内部运作，也在推动形成一种更加透明、更具参与性和协作性的治理形态[6]。这条路径将技术置于广阔的政治与行政变革中考察，强调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塑造。

第三条路径是对算法决策与自动化治理的批判性聚焦。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算法，在公共部门直接应用于社会福利分配、刑事司法风险评估、城市管理等具体领域，学术研究的焦点迅速转向算法本身。学者们开始密切关注算法在决策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西方学者尖锐地揭示了算法中可能隐藏的社会偏见、公平性缺陷以及问责难题[7][8]。这一路径探讨的议题包括算法如何重新定义行政自由裁量权、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与程序正义、以及算法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等[9]。近年来，为应对这些风险，关于“可解释人工智能”如何在高风险的公共决策中实现透明与合规的研究已成为热点[10]。这条路径标志着研究重心从“数据”本身，转向了驱动决策的“智能模型”及其“自动化过程”，并伴随着深刻的伦理与政治哲学反思。Lee 和 Dai (2025)进一步将这种批判性分析延伸至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系统揭示了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评估中嵌入 AI 所带来的治理张力[11]。

总体来看，这三条路径呈现出递进且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追求科学性的“循证决策”，到关注系统性变革的“数字治理”，再到聚焦智能核心及其伦理风险的“算法决策批判”，体现了国外学界对技术赋能决策的理解不断深化、具体化和批判性加强的过程。

2.2. 国内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相关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于西方，但发展非常迅速，并且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治理实践紧密相连，形成了鲜明的“实践先行、理论跟进”的特色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约 2013 年前)是聚焦于“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效率提升时期。理论和实践重心在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政府内部办公效率和对外信息发布，核心目标是建设基础数据库和实现办公自动化。以汪玉凯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探讨了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阶段、战略重点与面临挑战[12][13]。这一阶

段为后续的数据资源积累和政府在线服务能力打下了基础，但决策的“智能化”尚未成为核心议题，技术主要扮演的是辅助支撑角色。

第二阶段(约 2013~2018 年)是“数据驱动”与“服务转型”协同推进的关键时期。随着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研究焦点转向数据资源的治理、开放与价值实现。在理论层面，研究着力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概念体系与机制框架[14]，并深入剖析数据共享驱动业务流程再造的内在机制[15]。在实践与理念创新层面，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为代表的探索催生了治理模式的平台化转向，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协同的服务生态[16]。与此同时，大数据赋能的范围也从政务服务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治理领域，初步形成了数据驱动治理的理论论述[17]。总体而言，本阶段的研究共同完成了从关注技术效率到重塑数据要素与治理模式的双重范式转换，为后续智能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2019 年至今)是“智能融合”与“风险规制”同步深化的阶段。研究重点转向人工智能等技术公共决策的深度结合及其治理挑战。在应用层面，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场景化与机制化特征，不仅关注区块链等技术支持下的数据共享机制[18]，更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循证决策范式的系统性变革[19]。与此同时，对技术应用的批判性反思也更为聚焦。学者们既从宏观层面审视技术赋能的整体向度与限度[20]，更具体地剖析算法决策等前沿应用的风险生成机理与防范策略[21]。这标志着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时期：在推动决策智能化的同时，高度重视与之相应的伦理框架与风险规制体系的构建。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历程呈现出清晰的“先建基础设施、再管数据资源、最终赋能核心决策”的阶梯式发展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其演进快速，且与政策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应用探索与理论反思相互促进的本土特色。

2.3. 国内外研究的比较与理论启示

对比上述两条脉络可见，国内外研究在核心关切上存在显著分野：西方学界更多聚焦于算法对个体权利的冲击，如公平性、隐私、问责等，其批判性视角源于深厚的自由主义法治传统。而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技术对治理效能的提升，风险讨论多集中于数据安全与组织适配，对算法权力本身的反思相对薄弱。

这种差异根植于不同的制度语境。西方“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让渡与协作，而中国实践则嵌入“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的制度框架。在此语境下，基层政府引入算法决策的动机、采纳意愿、使用方式都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算法不仅是效率工具，更可能成为上级考核压力下的“避责策略”或“政绩展示”，这一现象在西方文献中鲜少讨论，却是理解中国算法治理的关键切口。

3. 技术体系、应用场景与治理效能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并非单一技术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涵盖数据、算法与制度的综合治理体系。它通过构建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深度嵌入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核心场景，从而显著改变着政府的决策模式与治理效能。

3.1. 技术体系：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协同赋能

决策智能化的实现，依赖于一个由数据层、分析层与应用层构成的协同技术体系。

数据层是基础与起点。其核心任务在于整合政务数据、社会舆情与物联网感知等多源的数据资源。然而，数据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治理打破“数据孤岛”，建立统一标准与共享机制，形成高质量、可流通的数据资源池。这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涉及深层的部门协同与制度构建，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22]。

分析层是提炼洞见的核心。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解析海量文本，把握社情民意；机器学习算法可

发现规律、预测趋势，推动决策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干预。马雨萌等(2025)将政策文本语义分析的线索归纳为政策演化、政策协同、政策扩散等维度，为从海量公文中系统提取决策证据提供了方法论框架[23]。以 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进一步提升了复杂信息的处理与交互效率[24]。需要强调的是，智能分析的效能并非自动实现。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高度依赖于物联网等基础设施提供的实时数据供给，以及政府部门为吸纳算法建议而进行的治理流程再造[25]。同时，算法应用的公平性与可解释性日益受到关注，推动着可解释人工智能(XAI)在高风险政策领域的发展。

应用层是价值实现的界面。决策支持系统与政策模拟平台充当“数字沙盘”，供决策者预演政策效果；数据可视化工具将复杂结果转化为直观图表；智能问答系统支持自然语言交互获取信息。这些工具共同提升了决策效率，但其成效同样取决于决策者的数字素养与组织的协同机制[26]。因此，技术的真正赋能，离不开与制度环境、组织能力的深度适配。

3.2. 应用场景：效能提升与风险并存的双重图景

上述技术能力在具体治理场景中的应用，呈现出显著的“双刃剑”效应。

在城市治理领域，智慧城市建设正从技术集成转向治理模式更新。通过整合传感器数据与智能算法，城市得以实现对交通、环境、公共安全的精细化管理与预测，这显著提升了运行效率与响应速度。然而，高度数据化的治理也引发了隐私保护与数字鸿沟扩大的担忧。有研究指出，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包容的公众参与机制，并贯穿公共利益导向的理念，防止单纯技术导向[27]。

在公共服务领域，大数据为政策全周期提供了新方法。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分析助力于疫情监测与资源调配，但其应用可能受数据质量、算法决策偏差制约，甚至存在证据被“选择性使用”的风险[28]。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时，技术工具的有效性也深受组织内部准备情况和数据安全顾虑等因素影响，表明技术采纳是一个复杂的组织适应过程。对此，Fan(2025)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要化解这些风险，关键在于构建包含技术政策、监管框架与多利益相关方协作在内的综合治理蓝图[29]。

在应急管理领域，大数据助力实现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预警的转变。舆情分析可以及时洞察社会情绪与风险苗头。然而，算法预测的准确性以及自动化决策出错后的责任归属，构成了新的问责挑战[30]。

总体而言，大数据驱动决策在提升政府感知、预测与响应能力，推动政策过程向更具弹性的“迭代循环”演进的同时，也伴随着三大核心风险：数据基础不牢、算法伦理失范，以及组织能力滞后。另外，若缺乏配套的制度变革与组织学习，单纯的技术投入往往难以见效。

3.3. 中国实践的特色路径

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色是公共价值导向明确，将技术应用的成效最终落脚于提升民众获得感与满意度。沈倩等(2025)指出，单纯依赖算法决策可能导致“公共利益隐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人类经验知识嵌入算法模型，使技术推演始终保有“人的温度”[31]。与此同时，中国推进策略强调整体性，注重通过高层级的战略规划与跨部门统筹，推动技术、管理与组织协同变革。李睿等(2025)将其系统化为数据治理、技术创新、政策法规、人才培养、跨部门协同五大建设路径，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实施框架[32]。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快速学习与调适能力，则进一步确保了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转向对数据安全、算法治理等风险的关注与规范。

综上，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是一项复杂的体系，其巨大潜力与多重风险并存。中国的实践表明，技术的成功赋能离不开清晰的公共价值锚定、整体的推进策略以及与治理体系的持续适配。未来，构建一个平衡技术创新、制度保障与伦理价值的治理生态，是实现智能化转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 风险挑战与批判性反思

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在带来显著效率提升的同时，其引发的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也日益成为学界焦点。

4.1. 核心共识

学界普遍认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政府决策的深刻范式转变。其核心在于，决策依据从依赖决策者个人经验、部门内部信息等“有限理性”资源，转向基于跨域融合的多源数据集成、智能算法分析与实时反馈[33]。研究者普遍观察到，技术使得决策过程更为“循证”，数据分析被深度嵌入政策循环，特别是其动态监测与反馈能力，正推动传统线性政策过程向一个更具弹性与学习能力的“迭代循环”演进[34]。技术不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被视为重塑决策逻辑、增强治理回应性与科学性的关键驱动力。这一共识为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起点。

4.2. 关键分歧

在肯定技术赋能的大方向下，关于其作用机制与价值目标的深层分歧构成了学术争鸣的主线。

首要分歧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制度适配论”之间。技术决定论者倾向于认为先进技术的引入将线性地导向更优的治理结果，因而研究多聚焦于优化算法模型与算力。然而，制度适配论提供了更为审慎的视角，强调技术效能的发挥高度嵌入并受制于既有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与行政文化。例如，智慧城市研究中，人工智能的决策影响力被证明严重依赖于物联网数据的质量与连续性，以及政府部门是否进行了接纳智能分析的流程再造[26]。这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缺乏同步的制度变革与组织学习，技术投入的预期效益往往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治理失灵”而产生新问题。

另一核心分歧围绕“效率优先”与“伦理优先”的价值排序展开。一部分研究和实践着眼于技术带来的巨大效率收益，如资源优化配置与响应速度提升。但批判性研究发出了强烈的伦理预警，指出算法并非价值中立，其设计可能固化历史数据中的社会偏见，导致决策结果的系统性偏差[34]。此外，算法“黑箱”特性引发的问责困境，以及大规模数据采集对个人隐私的侵蚀，都使得如何在追求决策效率的同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程序正义与公民权利，成为理论与实践必须直面的尖锐矛盾。

4.3. 研究局限

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显著局限。首先，研究视角碎片化，缺乏整合“技术-组织-制度-伦理”的分析框架。其次，精细实证研究不足，对大数据如何重塑基层官员行为、府际协作模式等微观机制缺乏洞察。最后，本土理论构建相对薄弱，从丰富实践中提炼“中国话语”的能力仍有待加强。

5. 结论与展望

近十年研究表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推动政府决策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的新范式转型。国外理论循“循证决策-数字治理-算法批判”脉络递进；国内研究则与电子政务、数据治理到智能决策的实践同频共振。技术工具链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数据孤岛、算法偏差及组织适配等挑战。学界共识与分歧并存：转型趋势虽获普遍认可，但在技术决定与制度适配、效率优先与伦理保障之间仍存张力。中国实践以战略统筹与民生福祉为引领，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基于现有进展与不足，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寻求突破：

5.1. 深化技术治理的微观机制研究

当前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技术赋能的“应然”图景，但对技术如何重塑决策者行为、改变府际协作模式等微观机制缺乏洞察。未来研究应从“技术如何用”转向“技术如何被组织采纳并重塑行为”。据

此提出待检验命题：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官员对算法的采纳意愿与“避责动机”正相关，与上级考核指标的匹配度则决定其持续使用程度。当算法能承担责任或转化为可量化政绩时，采纳意愿较强；反之，即便技术性能优越，也可能被搁置或边缘化。

5.2. 探索算法问责的本土化分析框架

算法问责在西方语境下主要指向“个体权利保护”，而在中国语境下则需兼顾“治理效能”与“程序正当”的双重目标。本文尝试将算法问责分解为三个维度：技术问责、程序问责、组织问责。三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过度追求可解释性可能削弱模型性能，程序透明可能引发博弈行为，而责任分散则可能导致“有组织地不負責任”。未来研究需追问在何种条件下三个维度能够达成动态平衡。

5.3. 推动本土化理论创新与对话

未来研究需更多关注技术引入对中国特有制度逻辑的深层影响。可将“运动式治理”与“算法动员”进行对话，探讨重大突发任务中算法如何被迅速动员，及其与常规治理的差异；也可将“条块关系”引入算法采纳研究，考察当算法由“条条”部门开发、却需“块块”政府执行时，条块间的目标分歧如何影响算法的实际使用。

最终，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智能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构建一个技术应用、制度保障与价值伦理深度融合的治理生态。

参考文献

- [1] Margetts, H. and Dunleavy, P. (2013) The Second Wave of Digital-Era Governance: A Quasi-Paradigm for Government on the Web.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71**, Article ID: 20120382. <https://doi.org/10.1098/rsta.2012.0382>
- [2] Janssen, M. and Helbig, N. (2018) Innovating and Changing the Policy-Cycle: Policy-Makers Be Prepare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5**, S99-S105. <https://doi.org/10.1016/j.giq.2015.11.009>
- [3] De Mauro, A., Greco, M. and Grimaldi, M. (2016) A Formal Definition of Big Data Based on Its Essential Features. *Library Review*, **65**, 122-135. <https://doi.org/10.1108/lr-06-2015-0061>
- [4] Head, B.W. (2016) Toward More “Evidence-Informed” Policy 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 472-484. <https://doi.org/10.1111/puar.12475>
- [5] Cairney, P. (2016)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Palgrave Macmillan.
- [6] Mehr, H., Ash, H. and Fellow, D.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Citizen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Harvard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1-12.
- [7] Eubanks, V. (2018)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St. Martin's Press.
- [8] Noble, S.U. (2018)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YU Press.
- [9] Zarsky, T. (2016) The Trouble with Algorithmic Decisions: An Analytic Road Map to Examin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Automated and Opaque Decision Making.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1**, 118-132. <https://doi.org/10.1177/0162243915605575>
- [10] Papadakis, T., Christou, I.T., Ipektsidis, C., Soldatos, J. and Amicone, A. (2024) Explainable and Transpa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ublic Policymaking. *Data & Policy*, **6**, e10. <https://doi.org/10.1017/dap.2024.3>
- [11] Lee, J. and Dai, Y. (202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Driven 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Policy Cycle: Comparative Applic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7**, 477-493. <https://doi.org/10.1080/13876988.2025.2598371>
- [12] 汪玉凯. 中国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J]. 新视野, 2002(2): 54-56.
- [13] 汪玉凯, 杜治洲. 电子政务与现代政府组织模式重构[J]. 新视野, 2004(4): 40-43.
- [14] 郑磊. 开放政府数据研究: 概念辨析、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1): 13-18.
- [15] 徐晓林, 明承瀚, 陈涛. 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研究[J]. 行政论坛, 2018, 25(1): 50-59.

- [16] 陈涛, 董艳哲. 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提升政府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J]. 电子政务, 2016(8): 2-5.
- [17] 孟天广, 赵娟. 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社会治理: 理论建构与治理体系[J]. 电子政务, 2018(8): 2-11.
- [18] 张楠, 赵雪娇. 理解基于区块链的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 从协作共识到智能合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 77-82.
- [19] 张红春, 杨涛. 技术赋能循证: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循证决策范式变革[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4): 44-56.
- [20] 陈潭. 国家治理的大数据赋能: 向度与限度[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5): 133-143.
- [21] 周济南, 苏厚任. 政府算法决策风险的生成机理与防范策略: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分析框架[J]. 理论月刊, 2025(1): 46-55, 156.
- [22] 尹丽英, 赵捧未, 秦春秀, 刘玮. 科技管理数据服务模式创新: 从多层用户需求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4): 82-88, 65.
- [23] 马雨萌, 李鑫鑫, 王延飞. 循证决策场景下公共政策文本语义分析的线索发现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5, 48(7): 132-140.
- [24] 熊光清.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2): 173-179.
- [25] Bokhari, S.A.A. and Myeong, S. (2023) The Impact of AI Applications on Smart Decision-Making in Smart Cities as Mediated b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Governance. *IEEE Access*, **11**, 120827-120844.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23.3327174>
- [26] Aldossari, S., Mokhtar, U.A. and Abdul Ghani, A.T. (2023) Factor Influencing the Adoption of Big Data Analytic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and Experts Review. *Sage Open*, **13**, Article 21582440231217902.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31217902>
- [27] 刘伦.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数字治理: 内涵与路径[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5, 27(5): 53-62.
- [28] Chao, K., Sarker, M.N.I., Ali, I., Firdaus, R.B.R., Azman, A. and Shaed, M.M. (2023) Big Data-Driven Public Health Policy Making: Potential for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Heliyon*, **9**, e19681.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23.e19681>
- [29] Fan, Y. (2025)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Opportuniti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3**, Article 1694996.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5.1694996>
- [30] Wieringa, M. (2020) What to Account for When Accounting for Algorithm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rcelona, 27-30 January 2020, 1-18. <https://doi.org/10.1145/3351095.3372833>
- [31] 沈倩, 刘俊娜, 杨菁. 经验知识嵌入算法决策: 人机协同决策的模型构建与公共价值实现[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5, 27(4): 90-101.
- [32] 李睿, 郭慈, 付雪娇. 大数据时代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探析[J].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2025(8): 16-17.
- [33] Mergel, I., Edelman, N. and Haug, N. (2016) Agile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A Research Agend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3**, 516-523. <https://doi.org/10.1016/j.giq.2016.07.004>
- [34] Hossain, M.A., Du, J., Mu, L. and Asante, I.O. (2023) Big Data-Driven Public Policy Decisions: Transformation toward Smart Governance. *Sage Open*, **13**, Article 21582440231215123.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31215123>